

经典精读

中国古代 经典二十讲

主 编◎孙家洲 黄朴民
执行主编◎宋洪兵

本书囊括了一个中国人一生必须了解的二十部经典，经、史、子、集四部俱全，先人哲思，前贤智慧，尽在其中。本书邀请学界名家担纲创作，力求探研每一部经典的作者背景、成书过程及流传演变、问题意识、主要内容、历史影响诸多方面。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兼具学术性、通俗性、人文性。

长

出

版

社

经典精读

中国古代 经典二十讲

主 编◎孙家洲 黄朴民
执行主编◎宋洪兵

長
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典精读·中国古代经典二十讲/孙家洲, 黄朴民主编.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445—0692—2

I. 经... II. ①孙...②黄... III. 古籍—简介—中国 IV. Z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2160 号

经典精读·中国古代经典二十讲

主 编: 孙家洲 黄朴民 执行主编: 宋洪兵
责任编辑: 张 樱
封面设计: 郭小军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 0431 - 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 - 88561180

读者服务部电话: 0431 - 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印 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30 千字

印 张: 21.7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431 - 87923413

回归传统 走近经典（代序）

一百多年以来，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始终是知识分子念兹在兹、难以忘怀的时代命题。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到梁启超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从现代新儒家的“内圣开出新外王”到李泽厚的“西体中用”，从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的“评法批儒”再到20世纪80年代彻底否定传统的“河殤”，从“文化热”到当今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无论给出的答案是持肯定态度抑或是站在否定立场，都紧紧围绕着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展开。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何既能使我们学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及政治理念从而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迅速走向富强，又能不致断送绵延数千年而不绝的中华文明，不使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民族彻底沦为文化的殖民地，最终妥善解决传统与现代的对接与融合，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首要问题意识。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的价值观念及其制度安排根植于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如果中国无法完全将“两希”文明的概念系统和价值取向移植进中国人的脑袋，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可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甚至政治制度，但是任何制度的具体运作均离不开“中国人”来完成，“中国人”当然是长期濡染中国文化而非“两希”文明的人。先进经验及管理制度的最终落实，必须结合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行动逻辑及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性由此得以凸显。简单讲，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立足于“中国的”现代化，立足于“传统的”现代化。无论从实践经验还是从理论层次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都不可能彻底切断与本民族历史和传统的血脉联系，彻底摒弃传统的现代化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最终意义上也无法真正实现现代化。总体而言，纵观整个20世纪的思想文化倾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无法离开中国的传统，已然汇流为一种普遍的共识，尽管其间还不时夹杂着一些不同的声音。

方法论层面达成的共识，并不能掩盖具体问题的分歧。当代中国文化建构的关键或许不在于到底要不要传统的问题，而在于如何“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回归传统是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題，关键在于如何回归，传统又是什么。有人主张儒家文化主干说，有人主张道家文化主干说，还有人主张儒释道主干说。当前中国盛行“国学热”，又有学者提出“大国学”概念，认为凡是涉及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都应该纳入到国学的范围。如果单纯从知识探求的角度而言，我们认为，“大国学”的多元性及开放性，确乎是一种当前值得大力提倡的研究取向。不过，绝大多数研究者的传统文化观念，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知识研究或绝对价值中立的学术探讨，而是始终伴随着一种文化建构的情结，这与一百多年以来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历史使命息息相关。传统文化如何参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构？各种“主干说”似乎隐含着如下逻辑：既然某家某派居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地位，那么当代中国的文化建构毫无疑问应该以“主干”而非“支流”为基础和核心，以至于有了所谓“儒家资本主义”、“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等说法。然而，党同伐异、出主入奴的“道统”或“正统”思维，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中究竟应该摒弃还是发扬？我想，在价值多元、思想开放的今天，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构建中只是多元中的一元，它将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新左派等思潮一道，共同建构未来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思想价值体系。传统文化本身亦是多元的，儒、释、道、墨家、法家，其实对于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确实难以区别出究竟谁为主干，谁为支流。一般认为，墨家在战国时期就中道衰亡，然而，中国古代民间的游侠精神及追求平等的观念，却又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法家思想在秦朝灭亡之后也并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隐居幕后，所谓“杂霸王道而用之”、“阳儒阴法”是也。

传统文化的多元性与长期存在的“道统”意识之间难免存在某种张力甚至冲突，前几年学界围绕着儿童“读经”而展开的广泛争论，则可视为这种张力的体现。作为一名传统文化研究者，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责无旁贷，同时，弘扬传统文化亦离不开经典的介绍和研读，问题在于如何介绍和研读经典。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本书所选经典，力求反映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及开放性特征，并不预设何为主干何为支流，以期使读者切实了解我们先辈思想的原貌。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乃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故而欲了解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诸子百家的思想必不可少。先秦诸子，按照班

固的说法，可以分为九流十家，荦荦大者，儒墨道法兵五家而已。故选老、庄、孔、孟、荀、韩、墨、孙子；《周礼》、《礼记》对于先秦古人的政治及日常生活影响至为深远；《尚书》文字古奥，思想深邃，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政治渊源均与此有关，故需介绍和了解；《周易》乃群经之首，对于了解和探索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至关重要；《诗经》记载大量先民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而且人们对于其中个别篇章亦可朗朗上口，故列入本书；《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重大历史事件，文笔优美，流传很广，对后世影响极大；《史记》、《汉书》是了解中国先秦秦汉历史的重要典籍，在二十四史中位列前两位；《坛经》、《世说新语》均是了解魏晋以降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基本典籍；唐诗李、杜分别代表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两种文学潮流，对后世的影响也至为深远。

当前中国“国学热”的兴起，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文化传统断层的危机意识，使得知识精英存有明确的继承精髓、接续文脉的文化使命感。其次，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两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国际事务中更多贡献应该来自中国的智慧，用学者的话来说，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舞台上了，但是站在舞台上就不能不说话，不能总重复别人说过的话，因此，沿着“什么是中国的贡献”这样的逻辑，强调中国思想智慧的重要性。显然，这种观点是立足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比较得出的，认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并不存在优劣之分，西方文化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其缺点可以从中国文化中得到弥补。中国思想对伦理亲情的重视，对民心的深层关照而非仅仅停留在民主制度的形式层面等，都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最后，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人们在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更追求一种包括精神内涵的品质生活，这是当前国学热之所以能够在社会范围内热起来的根本原因。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横向上看，固然存在一些分配不公、城乡差距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是从纵向上看，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是在不断提高的，尤其在一些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起，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缘由，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蕴涵修身养性及人生智慧的因素，它可以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精致，言谈举止更有风度的同时，解决人们诸多人生困惑，可以使自己的日常消遣显得更为儒雅淡泊，可以使人们的生活品质得以提高。在民间群众那里，国学热的最基本动力在此，其中并不蕴涵太多的接续文脉、

秉承文化主体性的自觉意识。其中也不乏让孩子多掌握一门本领和技艺，将来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保持优势的现实想法。国学热的“草根性”是“回归传统、亲近经典”的源泉与动力。

国学热的“草根性”，决定了普通大众不可能像象牙塔中的学者一样皓首穷经地去研读一部经典，因此，如何能让所有热爱并关心中国古典文化的读者利用最短时间相对完整地了解中国古代经典，如何让人们在轻松愉悦的阅读中真正体验到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和魅力，因此，兼具学术性与趣味性，是我们编著本书的初衷。需要强调的是，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本书选取的经典亦是挂一漏万，管中窥豹而已，欲真正“回归传统、亲近经典”，必须阅读元典，接触经典文本。本书的功能，旨在抛砖引玉，使读者对于所选经典的来龙去脉有一个相对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本书邀请学界名家担纲创作，如《孙子兵法》研究名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黄朴民教授，《史记》研究名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孙家洲教授，《孟子》研究名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教授，《诗经》研究名家、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李先耕教授，《礼记》研究名家、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程奇立教授等，同时也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吉林大学古籍所等学林专精之士加盟，力求探研每一部经典的作者背景、成书过程及流传演变、问题意识、主要内容、历史影响等诸多方面，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兼具学术性、通俗性、人文性，适合每一位关心、热爱中国古典文化的读者。

阅读经典，亲近经典，应该成为一个真正有前途的民族的文化习惯。

编者
2008年5月

经典精读 · 中国古代经典二十讲

目录

回归传统 走近经典(代序)

- 群经之首——《周易》 / 1
- 中国最古老的政书——《尚书》 / 18
-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 29
- 最有争议的儒家经典——《周礼》 / 50
-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 / 67
- 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左传》 / 75
- 为政以德——《论语》 / 92
- 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 / 108
- 隆礼重法——《荀子》 / 123
- 百世谈兵之祖——《孙子兵法》 / 137
- 道法自然——《老子》 / 165
- 千古华章耀九州——《庄子》 / 178
- 中国古代的平民哲学——《墨子》 / 206
- 抱法处势则治——《韩非子》 / 220
- 无韵之离骚——《史记》 / 250
- 断代史的典范之作——《汉书》 / 261
- 魏晋名土的教科书——《世说新语》 / 271
- 中印文化的结晶——《坛经》 / 286
- 诗仙李白——《李太白集》 / 301
- 诗圣杜甫——《杜工部集》 / 321

群经之首——《周易》

刘光胜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周易》是一部古老的典籍，从汉代开始，被尊为五经之首，在此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神圣的经典，到现在，其流传的历史已近三千年，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在中华民族道德品格的塑造和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易》道广大，弥纶天地、包容万物，被称为“大道之源”，《周易》对我国古代哲学、宗教、史学、文学、政治、教育、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另外一部文化元典可与之媲美。

从17世纪以来，《周易》先后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传向世界，引起了世界上众多学者的重视和研究。作为中国哲学的母体和中国文化的符号象征，《周易》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周易》兴起的时代背景

《周易》是一部奇书，奇就奇在它是由符号和文字组成的，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周易》有很多难解之谜，但其中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阴爻、阳爻两个符号的含义是什么？这实际是追问卦画的起源问题；二是《周易》是卜筮之书、还是哲理之书？这是探讨《周易》一书的性质问题。千百年来，许多《周易》研究者对这两个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由于缺乏有力的证据，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易学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谜团。

这两个历史谜团的真正揭开，要归功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河南安阳、陕西西安都发现了一些卜骨，这些卜骨上刻有一些“奇字”，唐兰先生研究后认为，这些奇字是用数目字当做字母来组成的，并吸取了郭沫若先生的观点，认为它们类似于西周金文中的族徽。^①七十年代，陕西岐山带有“奇字”的卜骨再次出土，张政烺先生把商周时期甲骨上、铜器上的三十三个数字卦材料收集在一起，认为阴爻、阳爻是由数字符号演变而来的，长期以

^① 唐兰：《在甲骨金文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来困扰人们的这些所谓的“奇字”就是易卦^①，卦画之谜第一次得以揭开。沿着张政烺先生的思路，后来的学者又汇录了三十六条商周时期的数字卦材料，认为筮法的出现，最迟不能晚于武丁时期，运用筮法进行占卦，商人大大早于周人^②。

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把卦画刻在卜兆旁边呢？据《尚书·洪范》等篇所述，古代占问祸福，卜与筮作为两种独立的方术，每每并用，甲骨上的数字符号，往往与卜兆有参照的联系，是对同一事项占筮的结果，并不是由兆象得出来的^③。筮法至迟起源于商代中期，阴爻、阳爻是由数字符号演变而来的，无论在考古资料上、还是在传世文献上，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世本·作篇》将筮法的产生归功于商太戊时的巫咸，这种说法虽未必确凿，但从一个侧面说明筮法在商代历史悠久。商代“数字卦”的卦变，仍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可知当时筮法较为简单。商代末期，筮法进一步发展，数字卦已经变成了卦画，《尚书·洪范》记载箕子向武王传授卜筮之道，透漏出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三画卦与六画卦区别的信息。卦画产生以后，数字卦并没有立即消失，到战国时期仍然存在，湖北江陵天星观、荆门包山楚简就有成组的数字卦。

周初，人们更加重视筮法，《淮南子·要略》说“周室增以六爻”，当时筮法进一步成熟，主要表现就是六爻的产生。《汉书·艺文志》说文王演《周易》，“重易六爻”，当时人们由商代注重上下卦体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到对“爻”体的重视，认为一卦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的占筮结果，除了上下卦体以外，还与六爻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周礼·春官·宗伯》说《连山》、《归藏》、《周易》相同的是“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说明三易有相同的卦画系统，但没有说爻辞，爻辞系统很可能为《周易》所独有。王家台秦简《归藏》仍然不用卦爻辞和卦爻象来占，而只用易卦，也可说明这一点^④。《易经》中的卦爻辞，是当时筮人对占筮之事的记录，《易经》是由卜筮之官采辑殷周时期占筮记录编纂而成。《易经》的产生，本源于筮法，是筮法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而《易经》的成书，则推动筮法走向更加规范化和实用化的道路。

《左传》、《国语》引用《周易》二十二次，大部分事例是用《周易》筮占，说明春秋以前《周易》的主要功能仍是占筮。阜阳汉简《周易》以及与《周易》有关的望山楚简、包山楚简和新蔡楚简等材料说明，战国秦汉初期，《周易》仍

①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② 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981年第2期。

③ 李学勤：《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9期。

④ 于成宝：《从“数字卦”看〈易经〉的形成过程》，《社会科学家》，2007年第4期。

具有卜筮之书的功用。

筮源于数，《周易》源于筮，《史记·日者列传》说：“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周易》作为一部专业占卜的著作，正是在周人重筮这一历史图景下产生的。这时人们对于事件的考察，除了预卜吉凶以外，开始对影响实践结果的因素进行考察，正是在周代，《易》逐渐具有越来越丰富的义理和内涵，终至超出了作为卜筮之书的本来性质^①，孕育出了哲学思想的萌芽。

春秋时期，人们已经发现《周易》中蕴涵着哲理，《左传》襄公九年记载：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姤，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穆姜不信卜筮，提出了“四德”之说，与韩简^②等人开创了以义理解《易》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要》篇记载，孔子“老而好易”，当子贡责问孔子有违早年之教时，孔子回答说《周易》有“古之遗言”，“吾求其德义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正是在孔子时代，《周易》中所蕴涵的义理才真正得到重视，儒家的人文易学由此开创。上博简《易经》就是一部可以证明战国时期义理易学已经存在的经典文本。

《周易》作为一部诞生于殷周时期的“卜筮之书”，是这一时期筮法自身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融合凝聚新思想于易卦的过程，这两个方面交融汇合，相互激荡，共同构成了《周易》古经的文化底蕴。《周易》作为卜筮之书，是殷周时期卜筮文化的经验结晶；作为哲学典籍，见证了中国哲学走出巫史传统的艰辛历程。

二、《周易》经传的成书年代

《易经》作于何时？首先追溯它产生时期的是《易传》，《系辞下》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

① 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09页。

② 《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韩简说“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等语。

《易》之道也。”又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传》作者回顾历史，认为《周易》兴起于商末周初，周文王受到纣王迫害，困于羑里所作，但由于时间久远，《易传》作者亦不敢肯定，可见在先秦时期，《周易》的成书已成为一桩疑案。

《汉书·艺文志》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认为《周易》经传的形成，跨越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经历了伏羲作八卦、文王整理卦爻辞、孔子作“十翼”的过程。但五四运动以来，传统的说法遭到怀疑，对于《周易》古经成书的具体时间，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陈梦家、李镜池、宋祚胤认为它作于西周末年；廖平、皮锡瑞、陆侃如、梅应运认为它作于春秋时期，郭沫若认为它作于战国初期，陈玉森认为它作于西汉昭、宣之间。顾颉刚先生在详细考证了《易经》卦爻辞所涉及的历史故事之后，认为《易经》卦爻辞的“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①。这一说法又经过李学勤^②、廖名春^③等先生的补证，目前多数学者倾向于这一说法。

关于《易传》的成书年代，《史记·孔子世家》和《汉书·艺文志》都认为《易传》成书于春秋时期，此说影响深远。宋代欧阳修作《易童子问》，首先怀疑《系辞》并非孔子所作。其后叶适、崔述继承了欧阳修的观点，特别是崔述作《洙泗考信录》详加考辨，怀疑《彖传》、《象传》非孔子所作。

近现代以来，学者们又提出了种种异说：认为《易传》或成书于战国中期^④，或战国末期^⑤，或秦汉之际^⑥，或出于昭、宣以后^⑦。《易传》成书于战国时期，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是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对于各篇形成的具体年代，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战国前期说，一是战国后期说，争论的焦点为《彖传》、《象传》和《系辞》的年代。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易传》出土，为研究《易传》成书问题提供了线索，李学勤先生从考古学和文献学的角度，对《易传》的成书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说：“帛书《易传》的发现，说明《易传》的形成确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而且复杂的过程，但如果我们承认《子思子》的四篇出于子思，应该说《易传》的基本内容和结构在子思的

① 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燕京学报》第6期，又收入《古史辨》第三册上编。

② 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18页。

③ 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齐鲁书社，2001年，207-223页。

④ 张岱年：《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中国哲学》第1辑，三联书店，1981年版。

⑤ 郭沫若：《周易的制作年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7-385页。

⑥ 冯友兰：《易传的哲学思想》，《哲学研究》，1960年第7期。

⑦ 李镜池：《易传探源》，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1页。

时代已经有了。”^① 我们认为，目前这种说法较为准确可信。

三、《周易》经传的作者

八卦为何人所创？最早的说法是《易传》，《易传·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传》作者认为八卦为伏羲氏所创。《周易》经传的作者是谁？卦爻辞为何人所系？对于这一问题叙述比较详细的是《汉书》，《汉书·艺文志》说：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汉书》认为《周易》经传的形成，经历了伏羲作八卦，文王整理卦爻辞，孔子作“十翼”（即《易传》）的过程。郑玄持这种说法，但马融、吴陆绩等主张卦辞为文王所作，爻辞为周公所作。“卦辞文王，爻辞周公”的观点为孔颖达《周易正义》所采纳，成为易学史上的一个传统观点。

孔子与《易传》的关系，不仅是《周易》经传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直接涉及对孔子时代人们哲学思辨水平的总体估价，因此我们觉得有详加论说的必要。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易传》，《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班固在《汉书》中也持这种说法，汉儒对此深信不疑。首先对孔子作《易传》提出怀疑的是宋代的欧阳修，他著《易童子问》，以为《文言》、《说卦》以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②。这种说法为宋赵汝梅的《周易辑闻》、元王申子的《大易辑说》所继承，尤其是清代疑古思潮兴起以来，否定孔子作《易传》的观点占据了学术界的主流，清代的姚际恒、崔述、崔适、康有为，近现代的钱玄同、顾颉刚、钱穆、郭沫若、冯友兰、李镜池、陈鼓应等，皆持此种说法。

除此之外，学术界当然还有不同的意见，以顾实、金景芳、吕绍纲等先生为代表，他们认为，《易传》的内容不单一，很复杂，说《易传》为孔子作，不是说每字每句都是他亲手写定，而是说其中有孔子记述的以前的“易说”，有孔子

^① 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05页。

^②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易童子问卷第三》，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105-1124页。

自己写下来的对《易经》的解释和学《易》的体会，有弟子记录孔子的话，有后世窜入之文。其中除后世窜入者与孔子无关外，其余三部分应当说都是孔子的思想。这种看法确属真知灼见，但他们的声音在当时太微弱。

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易传》的出土，孔子与《易传》的关系再度成为学术热点。学者们对帛书《易传》前四篇中的“子曰”、“孔子曰”或“夫子曰”为“孔子说”多无异议，但对《繆和》、《昭力》两篇中的“子曰”之“子”为谁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子曰’，应即‘先生曰’，是欧阳修所谓的‘讲师之言’”^①。对此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②，如丁四新先生认为“《繆和》、《昭力》的‘子曰’当即是‘孔子曰’，与其他四篇帛书《易传》的‘子曰’、‘孔子曰’或‘夫子曰’相同，而非欧阳修所谓的‘讲师之言’”^③。我们认同丁四新先生的观点，认为帛书《易传》中的“子”、“夫子”都是指孔子。据帛书《要》篇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子贡对此很不理解，孔子对此解释说：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

“幽赞”就是用龟甲和蓍草进行占卜，预断吉凶，“数”就是指占卜及易卦中所蕴具的阴阳之数，“幽赞而达乎数”，就是通过对占卜工具的操作，以明察宇宙变化之数，这是史巫的做法。“明数而达乎德”，史巫把《周易》作为卜筮之用，而孔子却从中求其德义，完成了由史巫的“赞”、“数”到儒家德义涵养的转进。孔子注重天人关系的探讨，但关注的焦点不在于宇宙的本质和规律，而在于由人道上达天道，为人类社会的和谐提供本体论的依据。

帛书《要》篇记载孔子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易学史的发展果然证明了孔子当初所言。我们认为，说《易传》是孔子亲著是不正确的，因为《易传》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是学术界公认的结论；说《易传》与孔子毫无关系，同样也是不正确的。过去曾因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郑玄注云

① 李学勤先生认为《繆和》、《昭力》是传易经师的言论，参见李学勤：《周易溯源》，第320页。廖名春：《帛书〈繆和〉、〈昭力〉简说》，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

② 郭沂先生首倡此说，宋立林先生也持此种观点。参看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0页。宋立林：《帛书〈繆和〉、〈昭力〉“子曰”为孔子考》，《周易研究》，2005年第6期。

③ 丁四新：《帛书〈繆和〉、〈昭力〉“子曰”辩》，《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3期。

“鲁读易为亦”，并提到“《鲁论》‘亦’字连下句读”（《论语正义》），对孔子是否谈论《周易》有所怀疑，已有学者根据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指出，郑玄只是指出《鲁论语》“易”字可以写作“亦”，并非认为这里的“易”应作“亦”^①，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出土和《史记》的记载相互印证，孔子和《易传》的密切关系不能轻易否认。

我们知道，学术的进展，往往既有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新，《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韩宣子聘鲁，在太史氏处“观书”，见到了论述卦象的书——《易象》，说明在孔子以前，解释《易经》的传已经存在，孔子的易学当前有所承。先秦古书的成书，往往是先生讲授在前，弟子追述阐发在后，诸子著作不必本人手著的通例早已为学界公认，因此，《汉书·艺文志》说“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不能拘泥地理解为《易传》全都是孔子手作，而应理解为孔子是《易传》“一定意义上的作者”^②，在由《易经》到《易传》的创造性的思想转换中，有着主要的作用和突出的功绩。另外，对于《易经》的成书，文献记载伏羲“始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也应该从这个角度上进行理解。

四、《周易》的主要内容

易有三种，按《周礼·春官·太卜》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连山》为夏易，《归藏》为殷易，《周易》属于西周。从西周太卜所掌职责来看，《周易》与《连山》、《归藏》一样，皆为卜筮之书，属于数占。从《周易》产生和早期应用看，主要作为卜筮之书。《左传》、《国语》记载有关《周易》的事例共22条，用《周易》筮法者16例，便是明证。

《周易》的“周”历来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周代；二是指《易》道广大，弥纶天地，涵盖阴阳消长、循环、交替的所有变化，郑玄说：“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关于《周易》“易”字的含义，郑玄在《易论》中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易”字的含义一般有简易、变易和不变这三种含义。

《周易》一书分为“经”和“传”两部分，《易经》包括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分为上下两篇，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每卦包括卦名、卦象、卦辞、爻辞四部分，卦象有阳爻—和阴爻--两种符号组成，卦辞是

① 廖群：《筮人“掌三易”及〈周易〉在先秦的传播》，《周易研究》，2006年第5期。

② 李学勤：《古文獻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解释全卦的含义，爻辞是解释每一爻的含义，《易经》中的卦爻辞是对易卦象征意义的解说和人事吉凶祸福的判定。每卦有六爻组成，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六爻自下而上，依次用初、二、三、四、五、上表示其序位，一、三、五为阳位，二、四、六为阴位，爻之阴阳与位符合，即是“得位”。相邻各爻，若阴阳性质不同，则称为“比”。一与四、二与五、三与六爻中，若两爻阴阳性相反，则称为“应”。初、二、三爻合称下卦或内卦，四、五、上爻合称上卦或外卦。《易经》里有八个经卦，即“乾、震、坎、艮、坤、巽、离、兑”，分别代表“天、雷、水、山、地、风、火、泽”八种自然界的具体事物，当然还可指代其他事物，这在《说卦》中有很多阐述。八经卦每两卦上下重叠，排成六十四卦，称做别卦。

卦序就是六十四卦排列的先后顺序，今传本《周易》是按照“二二相偶，非覆即变”的原则排列的，六十四卦分为三十二组，每组的两卦如果每一爻都相反，像乾和坤，就称为“变”，如果把同组的一卦颠倒过来就成为另一卦，那么它们的关系就是“覆”。“二二相偶，非覆即变”和二进制原理非常吻合，反映的是一种阴阳相对的思想。自马王堆帛书《周易》出土之后，人们看到帛书六十四卦的卦序，和今传本并不相同，帛书卦序是将六十四卦分为八组，以乾、艮、坎、震、坤、兑、离、巽为顺序，并把它们作为每组的上卦，再按乾、坤、艮、兑、坎、离、震、巽排列每组的下卦，具体到每一组排列时，还稍有变化：为保证每组第一卦上下卦相同，须将和上卦相同的下卦提到前面来，如以坤卦开头为上卦，就将作为下卦的坤卦提到前面来。

帛书《周易》卦序证明了战国秦汉初期，《周易》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卦序，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帛书《周易》的卦序比今传本更早。今传本《周易》的卦序，有着久远的渊源，长安西仁村陶拍证明它在西周时期就已存在^①。

《易传》是对卦、爻辞的注释和论说，它分为《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共七种十篇，汉代学者称之为“十翼”，翼就是羽翼，为辅助解释易经之意。《彖传》分上下篇，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卦辞；《象传》分《大象》和《小象》两篇，《大象》解释各卦的象征意义，指出人们应如何仿效事物变化而行动，《小象》解释爻辞，说明每爻的基本观念；《系辞》分上下篇，具有通论性质，阐发《易经》的哲学观点；《文言》详细解说乾坤两卦的卦辞和爻辞；《说卦》总说八卦所代表的物象和重叠推演六十四卦所体现的原理；《序卦》是对六十四卦排列先后顺序的说明；《杂卦》是解说六十四卦的卦义。

^① 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37页。

《易传》对《易经》文辞的发挥，可分为取象和取义两类。取象就是用八经卦象征的物象，说明重卦的卦相，以论证所贞问之事的吉凶；取义就是以卦名的意义和卦的德行，来说明重卦的卦相，解释卦爻辞，阐发义理。《易传》将自然现象与人的社会活动结合在一起，以自然现象比附君子的道德修养，目的是为人间的社会秩序寻找形而上的理论依据。

传是对经的进一步阐释，它对具体卦相进行归纳总结，生发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意义。《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万物可分为阴阳两类，阳可以变为阴，阴可以变为阳，阴阳相互推移、相互作用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高亨先生说：“《易传》虽是筮书的注解，然而超出筮书的范畴，进入哲学书的领域。作者虽不是一人，而其世界观并无矛盾。各种互相补充，构成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①《易传》不仅用占筮的语言来解释卦、爻辞，而且探讨宇宙的起源、人类社会的秩序，对《易经》的思想内涵进行提升，可以说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著作。

卦爻辞可细分为占断之辞、取象之辞、记事之辞等，实际上，《周易》卦爻辞是种特殊的卜筮语言，内容涉及到殷周时期祭祀、征战、狩猎、工商贸易和行旅等方方面面，从中我们可以管窥到当时社会生活发展的面貌：从结绳至书契，从穴居到宫室，从厚衣以薪到葬之以棺槨，从蒙昧到开化，由野蛮到文明，在《周易》卜筮语言的外衣下，保存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变化的珍贵史料，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周易》古经和甲骨文是非常相似的。

五、《周易》的流传情况

据《左传》、《国语》记载的材料来看，春秋时期，人们主要把《周易》用作占筮之书，随着后人不断对它进行整理和阐释（其中主要是孔子），到战国时期，儒家经典《易传》出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大量出土的文献材料证明，战国到秦汉之际使用周易有三种方式：一是只用易卦求占，而不用卦辞；二是把《周易》当做实用的筮书本子，在卦爻辞后系以具体的卜事之辞，以便翻检断筮；三是把《周易》当做可以引以说理的经典文本进行编撰^②。特别是帛书《周易》，证明了《易经》存在着不同的卦序，《易传》有着不同的版本，可以说当时《周易》流传的版本复杂多样，易学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

秦代焚书，《易经》不在焚书之列，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易传》属儒家典籍，在焚烧之列，很可能像其他典籍一样，因藏于山岩屋壁而保存下来。上博

①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自序》，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1页。

② 陈仁仁：《从楚地出土易类文献看〈周易〉文本早期形态》，《周易研究》，2007年第3期。